

■往事

1936年10月,为粉碎国民党军进攻,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前线指挥,红军在宁夏海原、预旺和环县山城乡马掌子山、断马峁峁、哨马营一带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行了一次重大决战,史称“山城堡战役”。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是长征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环县山城堡战役纪念馆解说员孙亚洁指着纪念园周围的群山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当年的主战场哨马营,那边是断马峁峁。

在山城堡战役前后,红军在以山城堡为中心的环县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活动足迹,也留下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

一副马鞍,诉说军民鱼水深情

山城堡战役过去80多年了,环县有一户人家至今仍珍藏着这场战役中红军曾用过的一副马鞍。这户人就是环山川乡苇子城村熊湾组的熊明义。熊明义一家人对这副马鞍格外珍爱,平时专门用一个木箱锁着,每次有来客要看时,他才小心翼翼地取出,摆弄好每个部件,并绘声绘色地介绍物件和它背后的故事。

1936年6月,熊家人和当地百姓一样,听到背枪的来了,就跑到山沟里躲起来,因为他们以前被土匪骚扰怕了。红军到沟里喊着找人,通过数次接触,熊家人才知道共产党、红军和以前其他武装都不一样。

作为开明绅士,熊家人主动将土地分给了穷人,还腾出窑洞,让出水窖,奉献灶具给红军,积极配合红军开展工作。

据熊明义老人讲,山城堡战役前夕,红军经常出入他家,还主动帮群众劈柴、挑水、推磨,红军的一言一行让群众深为感动。熊家人也把红军当自己人,用自家种的麻给红军战士编麻鞋,烙饼子给红军吃。山城堡战役结束后,红军就把一副血染的军用马鞍留给熊家人作纪念,熊家的女婿许方银参加了红军。

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劝熊家人卖了马鞍,以解燃眉之急,熊家人没有卖;近年来,有人出1万元买这副马鞍,熊家人还是没有卖,他们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熊明义的父亲熊守国曾经这样说:“这副马鞍是红军留下的一个‘念想’,是军民鱼水情的最好见证。”

一眼清泉,支援战斗的“功臣”

环县是革命老区,也是资源型、水质型、工程型缺水并存的地区。山城乡是环县最干旱的地方,一年就有近半年时间缺水,“靠天吃饭,靠云吃水”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1936年11月,红军在山城乡山城堡打

长征最后一战背后的故事

响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红军在干旱少雨、气候干燥的山城堡,饮水成了最大的问题。山城堡有水,但大多是苦咸水,水质较差,口感苦涩,而且对人体伤害大。

然在山城堡李井子组有一眼清泉,这是当时山城堡境内唯一的甜水泉。据山城堡村68岁离任村支书冯世志介绍,在他爷爷小的时候,这眼泉就是方圆10多公里群众饮水的唯一来源,每到晚上,群众便排队取水,直至天明。

冯世志听老人们讲,当年红军进入山城堡后,因河水苦咸无法饮用,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红军战士来到李井子组的甜水泉边,依次排队喝水。为了确保后面部队有甘甜的泉水喝,前面的红军战士只能喝、不能给水壶里灌,水壶里只能带河里的苦咸水。战斗胜利后,这眼泉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泉”。

如今,随着扬黄工程和各种水利工程的实施,环县绝大多数群众都用上了甘甜的自来水。而那眼曾为山城堡战役胜利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泉”,一如往昔,净水自来,仍为当地不少群众提供着生活用水。

一张炕桌,保存一段红色记忆

“四川本是真四川,四川底下有一湾。里边包着重庆府,外边靠着火焰山。”这是环县洪德镇河连湾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纪念馆一张炕桌上的谜语,被制作炕桌的画匠写在了上面。

这个谜语有什么渊源呢?据环县地方文化学者陈希祥讲述,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前夕,红军指挥部就设在河连湾,与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当时,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与夫人黎黎住在院里,对面住的是政府主席马锡五。一天,朱德前去马锡五住处,看到房东家刚做好一张炕桌,一位老画匠正在上油漆、画桌面,朱德对画匠说:“你把我们四川的一件宝物也画上去吧!”画匠问是什么宝物?朱德张口说出了上面那个谜语,画匠就把这四句话写到了桌面之上。朱德又说:“那就在下面再写‘打一字’。”画匠照写了上去,可是对谜底百思不解。马锡五回来后,画匠就把炕桌让他看了,马锡五说这个字就是“燭”字(烛的繁体)。

当时办公条件简陋,马锡五就向房东借了这张炕桌,让李富春先使用。山城堡战役结束后,李富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他临走时将炕桌还给了房东。因为这张炕桌有这么一段故事,且与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房东就将其保存了起来,后来房东的孙子朱占会将它捐给了河连湾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纪念馆。

80多年过去了,那张老炕桌已然非常陈旧,当年写的谜语也已经很模糊,而几位老革命家的趣事却一直流传着。

□安志鹏

周作人在西安

1956年至1964年进行整风以前这七年之间的中国文联,十分重视对涉外艺术家的服务,提出“照顾那些阳光照不到的人,化腐朽为神奇”。按照这个思路,当时在中国文联组联部工作的佟韦先生负责联系周作人。

周作人,原名周櫟寿,又名周奎绶,后改名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那时的周作人,解放后因“汉奸”经历影响一直处于人生低谷,与日本夫人住在北京八道湾老房,年老多病,没有固定工资,儿子一家经济窘迫,都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付给他的稿酬,负担一家三代人的生活。虽生计艰难,仍笔耕不辍,经常夜里伏案,就是在夫人去世前后,也未中断写作。当时的中国文联领导听完汇报后说:周作人的学问和文章在全国,仍属一流,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1956年9月,中国文联决定安排周作人去西安看看。经过中宣部与陕西省委宣传部联系,决定此项工作由中国文联、西

安市文联、陕西省作协负责出面安排和接待,对外保密,不做宣传。9月14日,中国文联派人去八道湾周作人家通知他并征求意见。周作人很热情也很高兴,但没有当即表态。次日,周作人表示同意。9月23日,文联派车接周作人和另外两名艺术家一行五人到北京火车站,乘坐列车,第二日晚抵达西安火车站,西安市文联、省作协派人前去接站。

周作人一行被安排住进西安人民大厦,在西安停留了半个多月。他先后参观了西安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省历史博物馆,还安排参观了西安的工农业发展情况,先后访问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观赏了越剧《晴雯》。

周作人在西安的日子里,对每一个点都看得很细,听得认真。他几次说,自己平日很少外出,如今到外面一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西安工业的发展速度可观,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的。在桃溪堡村,他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很关

切,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他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安居乐业,对共产党的领导,我最佩服。”有一天,正值国庆节,周作人和朋友登上了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着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很感慨地说:“我过去(作者注:解放前)到过西安,那时的水都是苦的,如今人们吃上甜水了。城变了,世道也变了,一切都变好了。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变化着。今天的中国,确实变了。”他激动地对随行的中国文联工作人员提出:“我向往延安很久了,很想去看一看。”经请示上级,因考虑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当时的周作人已经七十二岁高龄,为安全起见,中国文联决定待过些时间交通条件改善再专门安排,直到周作人去世,他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956年10月9日晚,西安市文联、陕西省作协负责同志宴请周作人等。次日晚,周作人结束在西安的参观访问活动,乘车返京。 □冯西海

■钩沉

林徽因为何改名

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及一册《林徽因诗文集》,除个别文章指出其原名“林徽音”外,也几乎未记她的改名问题。

记得老作家施蛰存先生文章中提及到这位“男作家”林徽音。可翻读了几本所存散文集,没有寻到。近日获得一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沙上的足迹》(书趣文从第一辑),从中读到了这篇介绍这位“男作家”情况的《林徽音其人》。

据施蛰存记述,在1928年时,他的朋友戴望舒和杜衡,在杭州葛岭顶上,见到一个青年在焚烧一堆废纸。好奇,前去搭话。该青年说自己是上海人。这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报纸刊物愿意使用,退了回来,故此愤而烧之。

施蛰存在此还特别描述一句:“这个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徽音……”说他的职位是“银行小职员”。由此大致可见,林徽音是个文学青年,可文章大多不达标,退稿甚多。

施蛰存与戴望舒等,此时正在上海办刊物,办出版社。认识林徽音后,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这些发表的诗文,或许即是为林徽因见到的作品。)有关林徽音的文字情况,施蛰存也有介绍,说是因为他们办的水沫书店要出版翻译作品,林徽音曾自告奋勇参与,他们便请他翻译一本“普特婆的《虚无乡消息》”。结果,

稿子发排,由施蛰存校对,“才发现误译甚多”,甚至“中文也不好”。因此,施蛰存用了个特殊有味的句子:以后就“不敢请教了”。介绍到这里,“男作家”林徽音的文字水准,可以看得清楚了。林徽因有才情、文笔佳,不愿(应是不屑吧)此人文字与自己混同,实在说得过去。

施蛰存还简单介绍了这位林徽音后来的情况。说淞沪抗战以后,林徽音“举止逐渐变得怪气”:夏天穿一身黑纺绸短衫裤,走在马路上,有时左胸膛里露出一角“白手帕”,有时纽扣洞里插一朵白兰花,像穿西装一样。这就很怪异了。

再往后,此人吸上了鸦片。多次向施蛰存借钱,“急着要进‘燕子窠’”。1949年后,林徽音曾找过施蛰存,希望为他介绍英语教师工作,又要为他介绍翻译工作,大约因为了解其根底,“我都无法帮助他。”再后来,听说他被羁押在第一看守所……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由施蛰存对林徽音情况介绍可知,这个林徽因口中的“男作家”,文学禀赋十分有限,不仅外文不行,连母语“中文也不好”,这样的水准,林徽因当然“不愿为伍”。应该是怕玷污名声,索性连形音相近的名字也改了。

通过施蛰存的这一番介绍,我们对林徽因改名的理由,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 □杨建民

我的父亲闻一多

■人物春秋



清华园的清雅

1932年8月,父亲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他谢绝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亲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号。这里有大小房间共14间。电灯、电话、冷热水、卫生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也十分幽静。宽敞的庭院由矮柏围成院墙,一条甬道直通居室。

这是父亲一生中住过得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兴,再一次施展了艺术家的才能,对新居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布置。母亲说,“新南院”的住户,大多在院内栽种各种花卉。父亲却在甬道两旁植上碧绿的草坪。草坪上只各点缀一个鱼缸,里面几枝淡雅的荷花,几条金鱼在其间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别人家院里五彩缤纷,我们院中却满目青翠。

最令父亲自己满意的,大概要算他亲手在书斋窗前栽种的那几丛竹子了。他爱竹如宝,精心伺候,使它们生长得枝繁叶茂,后来在昆明时还常念起呢。

这潇潇翠竹、茸茸绿茵,透过书斋纱窗,与斋内满壁的古书、根雕的大师椅浑然一气,构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满诗意的画面,人在

自武大以来,父亲便潜心古典文学。回清华后,完全沉迷于古籍并乐而忘返。这种痴情也和他近年来内心的苦闷矛盾不无关系。到清华的第二年,父亲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倾诉道: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憾感——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向内”的路果然越走越宽,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除许多唐诗研究的成果外,从青大开始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多有所获;而《诗经》研究也硕果累累。冯友兰与叶公超后来谈起当代文人们,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的成功者”。

父亲也十分自信。他在对臧克家谈到陈梦家的考古成绩时说: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来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

这颗诗人的心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确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亲遇难后编《闻一多全

集》,曾惊叹父亲治理古代文献:“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贻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朱自清先生在谈到“学者中有诗人的闻一多”时,也特别指出了他治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盛赞父亲的学术散文“简直是诗”。

有这样一个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赵俣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

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



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风味的礼让。

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

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惧其烦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庄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通、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时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

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

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

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 □闻名

